

一、药物、犯罪与暴力：微观一级的影响

1. 与药物滥用有关的犯罪大多是非暴力性的，而且常常比较轻微。迫于经济压力取得药物的犯罪，如偷盗，比起药物引诱的暴力攻击更为普遍。然而，非法药物、犯罪和暴力的影响正在微观社会一级对当地社区造成极大的损害，因为这些社区的成员不得不生活在始终存在犯罪和暴力以及犯罪和暴力威胁的非法药物市场中间。

2. 与药物滥用有关的犯罪和暴力在社会的不同层次上表现为不同形式。有的犯罪和暴力形式与国际卡特尔有关，有的是吸毒者个人犯下的或针对吸毒者个人犯下的暴力罪行，也有的是受到暴力药物文化夹击的无辜的个人。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决定审查药物、犯罪和暴力在社会微观一级的影响，从个人、家庭、邻里和社区各方面研究非法药物滥用、犯罪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同时考虑到犯罪和受害情况。麻管局准备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微观一级的药物滥用和贩运与社区一级的暴力和犯罪事态发展之间的关系。各国政府执行关于药物滥用和贩运的国际药物管制条约的条款，可以减轻暴力与犯罪，为各国的主导社会环境造福。

3. 药物、犯罪和暴力在有组织犯罪、贩运药物和跨国犯罪网方面的宏观影响不同于当地的犯罪但却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麻管局认识到解决宏观一级贩运药物和跨国犯罪网问题以及在国家和国际两级作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刑事司法努力的重要性；但是，本报告的重点是同样重要的、针对参与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或在这方面处境危险的群体的本地化的和有目标的干预以及受影响的社区。

A. 特点和可能的起因

4. 药物滥用与其他刑事犯罪，包括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关联，从各种研究中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对犯下杀人罪和抢劫罪等暴力罪行的犯罪人所作的个案研究表明，药物滥用常常是一个关键因素。某些证据反过来也证明，暴力犯罪比率高与频繁地滥用药物有关。同时，尽管某些吸毒者参与暴力犯罪，但其他吸毒者既没有犯罪也没有做出暴力行为。对于这些结论必须谨慎地解释，因为这些结论没有揭示与非法药物滥用无关的暴力犯罪的其他原因，而且有选择地解释证据也没有对既未犯罪又未做出暴力行为的滥用者获得深入的了解。毫无疑问，某些家庭和某些社区中存在的暴力现象不只是非法药物滥用和贩运本地化的产物。与非法药物贩运有关的暴力也可能反映出某些社区根深蒂固的暴力文化，在这些社区中，暴力文化还有其他根源，如收入分配不平衡、内乱或战争。

5. 对此，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严重违法行为、犯罪、暴力犯罪和药物滥用与对个人和社区的消极后果之间存在着关联，例如：

(a) 1990年代后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五个警区中 69%的被捕者在被捕时测出至少有一种非法药物呈阳性反应；61%因殴打而被捕的人测出有某一种非法药物呈阳性反应；¹

(b) 在巴西，与药物有关的暴力是个极其严峻的国家挑战，对社区产生了消极影响。在一年里记录的 30 000 件杀人案中，相当大一部分可能与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药物有关。流落街头儿童就是贩运药物者的中间人，他们通常因为知道得太多、偷盗得

太多或在帮派和经销商之间的交火中被击中而被杀害；

(c)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世界银行开展的青年帮派与暴力调查表明，参与贩运药物的青年帮派一般比没有参与这种活动的人表现出更严重的暴力倾向。²

6. 本章所作出的关于药物与犯罪的联系可能的解释考虑到了以下主要观点：

(a) 药物滥用可能助长犯罪，犯罪也可能助长药物滥用；

(b) 药物滥用与犯罪可能受到数量不定的第三种变量的影响：生理、心理、情景和环境因素；

(c) 监督非法药物市场的方式可能对非法药物方面的犯罪和暴力产生影响。

(d) 社会经济因素，尤其在它们影响到年轻人时，会对与药物滥用有关的犯罪的程度和性质产生影响。

7. 两个核心问题是：

(a) 在社会微观一级犯罪和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程度和性质是什么？

(b) 影响个人、家庭、邻里和社区失足卷入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因素是什么？

B. 了解药物与犯罪

8. 麻管局审查了体现有关药物滥用和社会叛逆行为，包括暴力的现有思维方式的主要研究领域，并注意到各个学科的不同研究人员提出的一些要素，

作为对药物与犯罪的因果联系所作的解释。药物滥用与侵权行为（或暴力行为）之间的关系的主要解释可以概述为以下特征：

(a) 强调个人的解释，如生物和生理的解释，精神药理学的解释，以及心理的和精神的解释。这些学科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药物滥用对个人按各自的身体和心理特征说明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纳入了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对药物滥用和侵权行为做出解释。例如，精神药理学的研究把个人的心理与药物滥用结合起来，探讨药物、个性和人的情感状况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侵权行为；

(b) 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解释。这些学科包括社会学、犯罪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和文化研究。这些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具体探讨了各社会团体与药物滥用和犯罪的关系，并且采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例子。例如，社会经济的解释考察了收入分配、相对贫困和社会边缘化情况，因为它们会对不同的社会团体产生影响；这些解释考虑各个因素对药物滥用和相关犯罪行为的单独的和合并的影响。

9. 以个人为基础的学科主要将药物滥用解释为内部失调的外部标志。相比之下，做出以社会学和文化环境研究为中心的解释的学科则着眼于社会相互作用、行为规范、制裁和事件背景，将这些因素作为探讨药物与犯罪之间关系的主要说明性因素；这些内容构成了本章的重点。对药物滥用、犯罪和暴力的解释都是多种因素的；因此，可以利用一系列学科的解释来理解这种关系。

基于个人的解释

10. 强调个人的学科表明，不同的非法药物对大脑

和身体具有不同的影响，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个人。反过来，非法药物的后果也因消费量、个人体重和吸毒史以及遗传特性和个性体质对药物滥用的影响而不同。在实验室里进行的药物滥用和相关暴力的受控实验只能说明消费“药物 A”与“暴力行为 B”之间的因果联系。换言之，不提及影响个人行为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因素，便提出暴力行为与非法药物的摄入有直接的因果联系，是极其困难的，也是起误导作用的。

11. 在浩如烟海的关于药物滥用和侵犯行为的文献中着眼于一个学科的精神药理学研究发现，非法药物和合法药物，包括酒精在内，可能与侵犯行为有关，但某些药物没有这种关联。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喝酒刺激暴力行为的断言。相比之下，研究发现，摄入大麻和鸦片剂遏制了侵犯性，但还发现，在长期滥用这些药物之后戒毒导致了易怒和敌意。频繁滥用可卡因和苯丙胺与作为犯罪者参与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增加有关。使用巴比妥酸盐似乎与侵犯行为关系极其密切。

12. 尽管基于生物和心理的药物与犯罪联系的解释提供了广泛而有趣的深刻见解，但它们说明不了药物滥用的实际经验及其社会后果的次文化和跨文化变量。与贫穷社区不同，可卡因非法消费和贩运对许多社会群体的影响在实验室控制的药物滥用试验中解释不了。相比之下，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解释以经历过或避免了与药物滥用、犯罪和暴力有关的问题的社区中“活生生”的实例为基础。

强调社会和文化因素的解释

13. 犯罪和暴力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的证据涉及三大领域：(a) 展示药物滥用期间相互冲突的侵犯性证据的次文化和多种文化社会研究；(b) 按性别、

年龄、种族和社会阶级等变量分列的、与药物滥用有关的暴力的社会结构模式；和 (c) 足以说明决定暴力行为发展方向的社会文化模式或行为规范的侵犯行为。

14. 美利坚合众国的快克可卡因市场的出现和衰落，以及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初美国相关的暴力犯罪率的升降，通常用于说明犯罪和暴力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与快克可卡因有关的暴力的起因通常有该药物对使用者强烈的精神药物影响、持枪团伙的涌现以及警方严打贩运药物团伙的影响。

15. 有人认为，药物与暴力的关系体现为三种独立的且截然不同的方式(三重模式)：(a) 精神药物性，表明暴力是精神药物对滥用者产生严重影响的结果；(b) 经济强制性，表明暴力行为有助于赚取购买药物的资金；和 (c) 制度性，表明暴力与非法药物的推销有关。研究一般表明，精神药物暴力，包括杀人经常与酗酒有关。相比之下，与药物有关的经济强制型暴力很少见，但为了获得药物的经济强制性犯罪则常见。制度性暴力则与争夺非法药物市场的“地盘”战有关。

16. 基于上述三重模式的研究表明，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的减轻归功于社会规范或行为方式的改变，在纽约，这座城市的特点是在不同类型的非法药物的普遍使用方面，其街头药物市场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时代都与各不相同的出生群有关，各群人具有特点鲜明的行为模式。

17. 各个不同的出生群在药物滥用和因此产生的暴力和非暴力行为方面的差异的历史证据表明了不同药物和非法药物市场及不同的暴力犯罪的社会规范的影响。但是，这种研究没有阐明的是，行为规范是否是药物暴力减轻的因果因素，非暴力行为规范

是否只是药物暴力程度减轻的一种后果。反过来，行为规范必须解释为因背景不同而不同，在任何时候各个社会集团中都各不相同。此外，与药物有关的犯罪和暴力的影响必须解释为超过了对药物滥用者和非法贩运药物产生的直接影响，必须考虑社区成员感到不安全，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因药物文化的改变而受到了影响。

18. 另外还需要考虑形成一段时间里药物与犯罪的关系的其他相关因素，如总体经济形势，特别是失业率。主要社会经济状况对于包括暴力犯罪在内的药物有关的犯罪的影响是麻管局 2002 年报告的重点。³ 总之，受失业率高和社会安全状况不好之害的社区是提供替代收入来源的贩毒团伙渗透的首要地点。如果放任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这种社区就会与采用暴力手段保住其非法药物市场的贩毒团伙和当地贩运者发生冲突。然而，并不是所有失业率高和具有社会贫困标志的社区都一定会呈现犯罪和药物滥用率高的特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与当地社区共同努力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替代创收形式可以遏制犯罪和非法药物市场的势头。反过来，高收入社区也有药物滥用和犯罪的现象，但这些社区的犯罪往往呈现欺诈而不是人际暴力的形式。

执法对微观一级的药物、犯罪和暴力的影响

19. 当试图理解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在社会微观一级的事态发展时，需要考虑另一个因素：当地执法机构的干预程度和性质。执法机构的作用和活动具有超出具体吸毒场所的直接背景的后果，因为它影响了周围社区。反过来，必须把警察和刑事司法干预理解为反映的是政府的政策和各政党委托研究的课题。

20. 从本质上讲，执法干预旨在遏制暴力行为并处

罚暴力行为。努力通过监禁改变犯罪者的生活环境，就是为了通过处罚威胁进一步预防暴力并阻止初犯或屡犯。执法干预是大多数国家对暴力和药物滥用做出的最显著的反应。但是，在执法的同时必须采取其他措施，以便产生理想的持久影响。仅仅监禁会使暴力行为加重而不是减轻暴力。

21. 对非法药物市场的严打会对在低收入街区生活的药物滥用者（和不滥用药物的人）和没有参与犯罪活动的人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在充分掌握当地药物滥用者、少量贩运者情况和当地社区“无辜”成员的关切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敏感的社区警方行动，可以确保避免对当地非法药物市场进行的严打失败。有针对性的长期警方干预，再加上经济和社会举措，可以促使警方在微观一级所作的努力取得成功。得到适当的社会支持并拥有替代创收手段的社区与执法机构密切合作，可以较好地避免与其他社区机构合作不奏效的警察干预所面临的意想不到的困难。

22. 了解执法的影响有助于拟订干预战略。在当地非法药物市场上买卖双方彼此相识，他们不愿意争夺地盘。相比之下，在非法药物市场上，买卖双方通常素不相识，他们更愿意争夺地盘和互相竞争；因此，在公园和公共汽车站等公共场所，发生暴力的机会也增加。在公共场所的非法药物市场上，卖主之间充斥着暴力竞争，其影响只会对不得不使用公共场所来进行毒品交易的当地社区产生消极后果。随着非法药物市场的成熟，新技术，如移动（蜂窝）电话、呼机和因特网继续取得进步，非法药物交易会可能越来越远离公共场所，因此也会降低社区成员在敌对的贩运药物团伙通过暴力决一胜负的交易中遭受袭击的风险。但是，来自社会经济最底层的最易受伤害的药物滥用者，如许多海洛因上瘾

者不可能获得新技术，因此仍然易受暴力犯罪之害。

23. 在对非法药物市场严打的同时如果不努力提供替代的收入来源，这种警方干预从长远来说是不会成功的，因为社区成员的收入将继续依赖非法贩运毒品。最终最坏的情况就是执法当局放弃这些社区，贩运药物团伙随后进行暴力接管。

C. 青年、帮派、药物和暴力

24. 对按年龄、性别和种族分列的变量进行的连续纵向研究和评估表明，随着年轻人由青少年变为成人，暴力的感觉征兆在波动。父母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轻，但同伴的影响随之增长，当年轻人，主要是男青年的环境因消极因素而变得复杂，他们染指暴力和/或药物滥用的可能性就会增大。研究人员尽管难以确定影响年轻人涉足与毒品犯罪有关的暴力犯罪的具体因素，但他们强调以下因素助长了青年人涉足暴力犯罪和/或药物滥用：

(a) 环境：社会经济地位低和/或住在犯罪率高的失业街区；受害率高；

(b) 家庭变量：父母过早分居；跟父母不亲密；父母态度恶劣；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不连续；目睹家庭暴力；

(c) 态度和伙伴关系：不良的同伴关系；对药物滥用或暴力持赞许态度；

(d) 个人特点：少数人团体的成员；学习困难和/或不上学；

(e) 行为问题和精神病理障碍：报告的犯罪活动率高；药物滥用开始得早；贩运药物；行为失调；社会叛逆个性；感受到的或观察到的情感问题。

25. 鉴于许多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罪行都集中在社会地位边缘化的青年男子身上，所以，需要考虑到青年文化，特别是青年帮派的作用。应该在不同类型的青年帮派及其与非法药物市场和暴力的关系之间划清界线。不同帮派在药物滥用和与药物相关的暴力方面也有所不同。大多数帮派暴力是青年帮派文化所特有的，与某些帮派有关的药物滥用和贩运药物助长了暴力正常化文化。暴力，如家庭暴力也是帮派成员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在帮派背景之外要么是犯罪者，要么是受害者。非法药物消费和竞争性非法药物市场的出现，可以触发暴力犯罪，而脆弱社区的经济和社会不安全也会助长这种暴力犯罪。暴力药物文化成功地破坏了这些社区的稳定。在拥有各种手段来消除非法药物的消极影响的较富裕的社区，这种药物的出现不太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26.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为了“保障”市场份额，武器，特别是枪支的供应情况和使用情况。有迹象表明，非法出售药物对非法持枪具有巨大影响。持枪现象的加剧助长了帮派暴力文化，这不可避免地对当地社区成员产生影响，他们不得不面对更严重的暴力威胁。

27. 研究年轻人中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背后的特点和原因时，决不能忽视以下现象：

(a) 第一，较小一部分少年暴力重罪犯占少年犯犯下的所有重罪的一大部分，他们还是严重的药物滥用者；

(b) 第二，尽管在青少年时期和刚成年时犯罪和暴力犯罪达到顶峰，但一旦到了二十几岁，大多数青年人长大成人，他们便摆脱暴力行为。

28. 同样，尽管某些帮派成员在成年后仍然保留其

身份，但大多数青少年在成人后都离开其帮派的社会领地；但是，年轻人涉足帮派文化，特别是暴力药物帮派对社区产生的消极影响产生了这样的后果：当成员个人离开时这种影响继续存在，因为招募新成员之后，继续对其当地社区施暴。

D. 后果和解决办法

微观一级的药物、犯罪和暴力影响

29. 非法药物市场为犯罪团伙提供的经济机会扩大了犯罪和暴力范围，因为罪犯为了市场份额而竞争；反过来，这会对当地社区产生可怕的后果。当地的毒品经销商和贩运者之间的敌对行动或“地盘之战”会发展成为公共场所内部和周围的暴力对抗，因此使得公共场所成为广大公众“不敢光顾的地方”。

30. 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猖獗的街区的治安恶化意味着，公众揭发涉嫌者以期遏制暴力浪潮的愿望被一种恐惧文化所阻碍，在许多情况下被对警方的不信任所阻碍。除此之外，社区可能依赖于当地非法药物市场来支持整个经济，因此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现状，如果这样做了，可能损害个人收入。某些社区当局本身也可能无法挑战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因为他们也面临着暴力危险，或者他们也受到腐败的影响，因此也麻木不仁。

31. 面对暴力所产生的压力、焦虑和恐惧反过来也干扰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和正常的发展进步：例如，他们的信任能力和拥有个人安全感的能力；发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技巧；他们探索当地环境的自由；及他们形成“正常”的社会关系的能力。遭受暴力，特别是幼小时遭受暴力，可能导致暴力行为的正常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暴力的具体表现形式。研究表明，11-17岁的青年男性参

与严重犯罪的危险性很高，如果他们：(a)重视家庭并与家人共处，但受到赞成暴力的态度的影响；(b)染上药物滥用恶习；(c)住在杂乱无章的街区里；(d)并且经常成为受害人并同时犯一些轻微的不法行为。

32. 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关于家庭暴力和社会暴力的研究及暴力对儿童和青年的影响的研究发展迅猛。但是，研究人员现在只开始在以下各方面确定微观一级暴力领域的概念：(a)街区和社区；(b)家庭和住户；(c)与父母和照顾者的关系；(d)与同伴的关系；(e)个人特点。了解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有助于找到人们介入犯罪、暴力犯罪和毒品犯罪的答案。国际社会最好还是把注意力转向这些领域，以努力了解和打击非法药物和相关的暴力犯罪对脆弱社区的青年人和成年人的消极影响。

33. 不言而喻，犯罪是个大问题，一个超出其对目无法纪程度的直接影响的问题。成人和年轻人介入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在微观一级对社区造成的社会伤害是无限的。社会的基础结构因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在社会的持续存在而受到挑战。遭受过多的与非法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社区也遇到其他犯罪现象和对与其相关的民间社会干扰加重的问题。

34. 当尝试证明和说明社区暴力加剧的原因时，社会资本或社区一体化程度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社会资本是指存在于社会关系和通过社会机构存在的、形成信任、义务和互惠基础的规范或“法律”。社区中的社会资本范围或按照既定的行为规范建立的社会屏蔽程度有助于解释暴力和犯罪程度。缺乏社会资本的社区可能遭受更多的暴力和犯罪。缺乏社会资本或社会资本外逃因与非法药物市场对社区的消极影响有关的暴力和犯罪程度加重而加剧。在

牙买加，五个贫穷城市社区的暴力与社会资本毁灭之间的循环关系得到了证明。⁴由于暴力，就业和教育机会减少，商业界不向本地区投资，当地人民不太可能建造新的家园或修缮现有的家园，迁徙自由被剥夺。反过来，这些条件致使当地基础设施和机会土崩瓦解，使得暴力行为，特别是年轻人的暴力行为的可能性加大，因为这鼓励了不信任，社会规范也受到挑战。社会资本流失与暴力犯罪，包括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加剧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

35. 与这种情况形成对照的是，中亚以广泛的贩运药物现象为患，但是该地区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程度较低。这可能是由于这个地区牢固的家庭纽带和严格的社会规范的影响。但是，有证据表明，形势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区域不安全加上药物滥用程度加剧，对社会稳定和相关的犯罪程度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样，东南亚年轻人滥用苯丙胺类兴奋剂现象的抬头和东亚消费非法药物现象加剧反过来也对这些地区的犯罪，特别是暴力犯罪产生了消极影响，因为行为规范受到了挑战。

药物、犯罪、暴力和受害情况

36. 一些研究突出了药物滥用对于受害危险和经历而不是对犯罪风险的作用。这与大多数强调药物滥用和犯罪倾向的研究方法背道而驰。这种考察受害情况的研究的可靠结论是，药物滥用导致受害危险加重。药物滥用者无论是首次滥用还是长期滥用，都容易受害，因为在漫长的滥用期里，药物可能使个人准确判断险境并对此做出反应的能力临时或永久地丧失。药物滥用者也会处于对暴力和贩运药物时动用枪支以为常的环境之中。

37. 女性药物滥用者遭受性侵犯的情况特别多。某些研究还表明，使用非法药物的妇女在一生当中比

有酗酒问题的妇女更可能受害。女性药物滥用者在药物影响下且生活在受害危险加重的环境下特别易受性侵犯之害。滥用药物的妓女也是高危人群。向毫无戒心的妇女提供所谓的“约会强暴”药物的新闻报道就反映了药物滥用与暴力受害方面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38. 成为非法药物消费者和/或经销商的学生也构成了受害于动刀动枪的暴力犯罪危险加重的一个重点群体。自1990年代初期或中期以来，学校里的药物问题和涉及武器的暴力犯罪就开始曝光。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罪行对学校的日常管理产生了消极影响，滋养了一种破坏权威的不安全文化，还导致学校与暴力犯罪之间形成了一种消极关系，并对学生、教师、家庭乃至整个社区产生了消极影响。

39. 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对某些个人和社会部门，即穷人和机能失调社区产生了过于严重的直接影响，而影响范围更广的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对犯罪的恐惧感和减少使用公共场所。对犯罪的恐惧比犯罪本身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更严重。尽管在大多数社会，只有少数不幸的人才遭受了多次受害的打击，无论受害形式是家庭暴力还是人际暴力形式，但大多数人由于他们对受害的恐惧感，间接地遭受犯罪之害。对犯罪的恐惧感或是对受害的恐惧感要求人们改变其利用公共场所——街头、公园、运动场、购物区——的方式，以避免遭受真实的或感觉到的伤害。尽管犯罪学证据表明，年轻人在公共场所遭受暴力的危险最大，但这并不能改变这一情况：受害危险最小的人，如老年人为了免受潜在的伤害而改变其行为。在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罪行猖獗的社区，年轻人遭受其他年轻人之害的危险可能最大，但妇女、老年人和幼儿的行动自由因预防受害的防范措施而被剥夺。

E. 微观一级对药物、犯罪和暴力的反应：政策影响

40. 年轻人当然不是与药物有关的犯罪和暴力的唯一源头；但是，他们通常在社区一级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表现形式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打击家庭、街区和社区各级严重的社会问题时，需要以年轻人作为对象。重要目标应该包括：

(a) 遏制药物滥用：年轻人的教育、支助和治疗方案与遏制药物滥用的执法倡议和刑事制裁结合起来；

(b) 减轻与药物有关的犯罪和暴力：向药物滥用者及其家人提供支助，向被药物摧毁的危险最大的社区提供支助。

41. 为了实现上述重要目标，必须强调刑事司法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专业的非政府组织需要彼此密切合作。应该通过社区监督倡议促进敏感执法，而不是由警方对药物滥用者和非法药物市场繁荣的社区给予严打。

42. 地方行政当局的特点通常是基于否认、过火行动和识别错误的程序对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问题做出反应。首先，地方当局否认他们现在面临着问题；第二，一旦承认问题，他们往往对问题做出严厉的过火行动（特别是在执法方面）；第三，如果缺乏准确的资料，可能会妨碍识别有关的犯罪问题并妨碍对其做出适当的反应。对暴力的这种典型反应强调需要利用关于当地非法药物市场现象和与该现象有关的暴力的有目标的研究，以避免干预措施不统一的缺陷。

43. 例如，对犯罪的年轻人和有这种危险的年轻人的干预包括：

(a) 系统协作：为有危险的少年和犯罪少年工作的机构之间发展多机构伙伴关系，以确保少年的确定需要在个案管理、选择性制裁和治疗过程得到满足；

(b) 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治疗：支付得起的社区药物滥用预防综合方案及药物滥用者治疗和康复方案。

44. 对这一问题的整治如果在没有与对脆弱社区提供敏感干预的其他机构建立工作关系的情况下进行，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例如，将吸毒上瘾视为健康问题，特别是对毒瘾最重的人来说，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个人和社区上，希望这些个人和社区能够以敏感的方式重新融入社会。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2002 年世界暴力与健康报告》⁵ 中提及的一个倡议涉及在 1990 年代中期促进公共卫生，以期打击哥伦比亚加里的暴力，这一举措致使杀人率大幅度降低。

45. 社区倡议成功地遏制了介入暴力犯罪和非法贩运药物的青年帮派的活动。毋庸置疑，成功地组织对帮派的社区反应行动，关键在于及时地看到帮派的兴起，以便在这个问题演变成一场危机并在当地一级影响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之前对付这一问题。成功的早期干预的重要领域包括：

(a) 早期的学校干预；

(b) 将有敏感目标的警察干预集中在有问题的地区；

(c) 为学校雇员、刑事司法工作人员、父母、社区团体和青年服务人员开办培训班；

(d) 各机构准确地收集情报和定期交换资料，力图了解这个问题的性质和程度；

(e) 与当地媒体合作，力图以敏感的方式报道任何药物和暴力犯罪事件，而不要故意炒做（否则会增加报复的机会或引起对犯罪的恐惧感）。

46. 尽管社区预防药物滥用的干预措施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完美标准”，但成为“良好做法”的一些干预措施让饱尝药物滥用苦果的个人和社区参与，其中可能包括个人咨询、人际交往技巧培训和家庭咨询。在社区一级，参加课后活动——如体育、音乐和计算机俱乐部——经常受到鼓励，作为一种预防药物滥用和相关犯罪并使现在的药物滥用者康复的手段。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积极促进旨在使年轻人远离毒品并参加不会对其自身的幸福或社区的安康构成威胁的其他活动的措施。⁶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⁷和大会⁸通过鼓励社会微观一级的干预来解决预防犯罪和少年司法问题。

47. 依靠成人和青年预防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社区干预的负责人必须意识到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各社区的预算基本上决定了他们可以合理地期望些什么以遏制药物滥用和暴力犯罪并对此做出反应，决定了这种服务能否长期提供。第二，刑事司法机构与社区组织之间缺乏协调，预示着社区方案的内容、宣传和持久性也好不了。第三，不同机构之间消极的“伙伴关系”会导致对其他机构提供的方案缺乏了解，这很容易导致工作重复。

48. 此外，当提及“社区”干预时，需要对以下问题给予适当考虑：“社区”一词对不同团体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这一词语的，“社区”一词的地理和政治含义是什么，在旨在讨论社区暴力问题的会议上谁将代表社区讲话。各社区不应该由学校、商界、教会、公共机构或自荐的“有觉悟的公民”担任代表但不适当考虑社区中往往被当地犯罪、暴力和非法药物市场搞得焦虑不安的成员：年轻人和

药物滥用者本身的代表性。

49. 一种名为恢复性司法的办法把犯罪者的康复与对受害人的权利和社区安全的关注结合起来。恢复性司法谋求在受害人、犯罪人和社区同意采取监禁以外的冲突解决形式的情况下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种做法是对既定司法形式的挑战。恢复性司法利用了土著社会传统的社区司法的概念，这种办法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以使犯罪者重新融入其社区，但不对饱尝犯罪，包括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恶果的受害人和社区其他成员造成伤害。尽管恢复性司法主要是针对少年犯罪的干预战略，但也适用于成年犯罪者。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成功地对一系列的犯罪采用了这种办法。恢复性司法作为社区微观一级的干预工具有前途，因为它强调家庭的作用并且能够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传统和不同的背景。⁹

50. 除了社会稳定之外，拥有非法药物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对于努力打击非法药物问题和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暴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提供这些收入来源的替代方式，依赖于非法药物市场产生的收入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是不可能摆脱这种处境的。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从商店店主到政府官员都依赖于非法贩运药物所产生的金钱，那么当地、国家和国际各级需要协同努力开展反腐败运动，提高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创造替代的收入来源。

F. 结论：干预的考虑因素

51. 贩运药物和相关的犯罪和暴力使当地社区与跨国犯罪网联系在一起。三份主要的国际药物管制条约没有将宏观和微观一级的药物贩运者区分开来。尽管政府和国际组织经常集中力量预防和打击跨国犯罪，但它们对直接影响人口的那种暴力注意得不

够。需要采取有目标的干预措施，以对付在微观一级运作的当地药物贩运者。

52. 参与当地一级非法药物消费和贩运药物的年轻人和男童不仅是暴力罪犯，而且也是其自身活动的受害者。药物滥用和相关的犯罪活动，包括暴力犯罪的个人成本对个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以及社会和经济安康具有长期和短期影响。反过来，这些活动造成的损害不只是对滥用者和销售非法药物者的损害，因为如果与药物滥用有关的暴力正常化且无所不在，家庭、街区乃至整个社区都遭受这种文化后果之害。如果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构成当地经济的基础，不再依赖非法药物市场的机会甚至会进一步减少。

53. 当地执法部门是如何与社区组织合作对微观一级暴力和药物滥用问题做出反应的，这对于暴力文化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社区监督对于遏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发制人的干预措施是十分关键的，它提醒当地刑事司法和社会机构在药物问题泛滥之前便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出现。为此，针对卷入药物滥用和贩运及与此项活动相关的暴力危险最大的社区和团体的干预措施能够遏制并预防犯罪。在让各社区参与管理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构成的威胁的多机构合作下，暴力药物文化的微观影响便能提前遏制住。当地社区传达出的信息必须是：

(a) 让非法药物经济在微观一级即家庭、邻里和社区一级存在对人而言是不利的；

(b) 全社会都来打击微观一级的与药物有关的犯罪是有利的。

54. 当提供打击与药物有关的犯罪的社区干预的“良好做法”实例时，需要注意不同市场的情况时各不

相同的。关于药物与犯罪的关系的解释必须细分为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加在一起可以更准确地描绘出药物、犯罪和暴力之间的关系性质和范围。基于可靠的研究掌握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罪行的特点、原因和后果，对于社区干预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55. 当提出对付药物与暴力犯罪的关系，特别是这种关系在社会微观一级的影响的实用方法时，要采用的最有用的途径可能是，审查一系列学科的个案研究，同时基于真实的成功故事为“最佳做法”干预措施提供建议。例如，麻管局注意到，少数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对药物犯罪者的专家法院设立的药物治疗法院¹⁰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在对待暴力程度低的罪犯时能够采用多学科办法。麻管局认识到这些法院能够为对付与药物有关的暴力方面重要的个人、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和社区问题做出更大的贡献。¹¹

56. 此外，解决社会微观一级药物犯罪联系的不利后果的任何干预措施还必须考虑到和处境不利社区相比在社会上处于有利地位的社区的下列经验。高收入的人们和受益于教育机会和其他社会好处的人们也受到药物滥用问题的影响，尽管人们可以提出，他们因为拥有对付这种挑战的财力所以更有应付能力。富裕社区也生活在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阴影之下，并且遭受邻近的贫穷社区成功地打击药物犯罪所产生的流离失所的影响。暴力的非法药物市场的出现所引起的对暴力犯罪的恐惧，影响了富人对公共场所的使用并且导致了安全防护措施的增加，如封闭社区。这种防护措施的长期影响只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因为富人试图逃避穷人在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中必然彼此争斗所带来的危险。加固目标法无论是否涉及财产或个人的安全措施，其滴入式影响都会是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不太富裕

的人最终会采用富人的防护措施。这使得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最容易受到药物犯罪及通常与此相关的暴力的影响。反过来，必须进一步研究药物滥用对监狱中的暴力行为的影响，因为监狱就是一个对暴力和药物滥用文化习以为常的社区。还必须深入了解学校、儿童之家和军队训练营等其他机构中发生的药物滥用、犯罪和暴力情况。

57. 尽管某些文化（例如，青年帮派赖以成长的文化）在非法药物市场出现之前，其内部早就充斥着暴力，其他文化则从与这种市场相关的暴力转向例如与内部争斗相关的暴力，但实际情况仍然是药物滥用和非法药物市场巩固了犯罪和暴力文化。地方、国家和国际三级需要通过伙伴关系，包括与各组织的伙伴关系，更及时且更有目标地付出努力，以便预防社会微观一级的药物滥用和暴力犯罪。同时，应该制订旨在进行社区微观一级干预的方案，以便管理与犯罪和受害相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了个人、家庭邻里和社区。

58.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正帮助各国政府找到社会微观一级的适当干预方案。

59. 麻管局强调，这种旨在遏制和打击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的干预活动一般应该包括：

(a) 社会经济发展：着眼于面向社会边缘化团体，如面临危险的穷人、弱势青年和少数民族的就业和创收及教育方案方面的当地努力；

(b) 城市复兴：着眼于社会经济投资，同时配合以当地设计倡议，通过创造不利于毒品交易和微观贩运的环境，以图“消灭”犯罪；

(c) 多机构的伙伴关系：着眼于当地政府、刑事司法机构、社区组织和青年组织对处于危险群体的综合干预工作，以努力避免工作的重复；

(d) 推广工作：着眼于通过学校、保健中心、运动中心和家庭及青年团体，向已经滥用或销售非法药物的人和有风险的人采取有目标的干预措施。

(e) 社区恢复性司法干预：着眼于在社区跨部门代表的领导下，通过恢复性干预措施，打击、遏制和解决当地社区与药物有关的暴力犯罪文化；

(f) 将性别、青年和少数民族关系考虑在内的干预：着眼于不同群体，如药物滥用者和潜在的药物滥用者的处境和具体需要，并鼓励合适的成人辅导处境危险的个人；

(g) 可持续的干预：着眼于长期干预方案的需要，以确保和产生适当的资源并在方案倡议中雇用当地人。

60. 上述内容应当与包括药物滥用者的治疗和康复在内的减少需求的努力结合起来使用，让它们共同发挥作用。只有在制定出全面的减少需求方案的情况下，解决非法药物带给社区的多种问题方面才会出现真正的进展。

二、国际药物管制系统的运作